

高等院校经贸与管理规划教材

**ZHONGGUO
DUIWAI MAOYI**

中国对外贸易

主编 丁 溪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高等院校经贸与管理规划教材

中国对外贸易

主 编 丁 溪

副主编 刘爱萍 陈雨松 刘立平

中国商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对外贸易/丁溪主编.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10

高等院校经贸与管理规划教材
ISBN 7-80181-610-2

I 中... II. 丁... III. 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
—高等学校—教材 IV. F75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986 号

高等院校经贸与管理规划教材

中国对外贸易

主 编 丁 溪

副主编 刘爱萍 陈雨松 刘立平

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话: 010—64269744(编辑室)

010—64245984(发行部)

网址: www.cctpress.com

E-mail: cctpress@cctpress.com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嘉年华文有限责任公司排版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980 毫米 16 开本

23.75 印张 435 千字

2006 年 10 月 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4000 册

ISBN 7-80181-610-2

F·954

定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212247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丁 溪

副主编 刘爱萍 陈雨松 刘立平

编 委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雨松 陈宗伦 程佳韞 程 明 丁 溪

侯银霞 兰颖文 刘爱萍 刘 辉 刘立平

刘 萍 潘 晴 彭苏颖 徐 斌 赵建平

前 言

我国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将丝绸等货物远销到各国。汉武帝以来开拓的陆海丝绸之路，将我国与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悠悠岁月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虽然不断发展，但也经历了起伏跌宕、荣辱兴衰。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中国对外贸易仍处于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关税不能自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把对外贸易的独立自主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但帝国主义的封锁、三年自然灾害及“十年动乱”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对外贸易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从1978年到今天，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列世界第32位到2005年的1.42万亿美元，并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出口国家。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人均进出口额不到900美元而世界人均超过2500美元。我国技术产品的出口中，85%都来自在华的外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此外，我国的服务贸易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因此，虽然我国是外贸大国，但不是真正的外贸强国。我国的外贸强国之路任重道远。

本书以历史的视角描述了从汉代以前的东西方贸易到21世纪的我国对外贸易的宏大画面，同时还介绍了我国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情况，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关系。本书内容翔实、取材广泛，为我国普通高校的经管类、经济类院校的本、专科及研究生，对外进出口公司、三资、合资、独资企业、海关、税务、商检等部门的涉外人员和我国广大的理论工作者、高级教师提供了一种理想的选择。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丁溪、侯银霞，中央财经大学的陈雨松、赵建平、兰颖文、彭苏颖，安徽工业大学的刘爱萍、刘萍、徐斌、潘晴、刘立平、陈宗伦、程明、程佳韫，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刘辉。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可能出现谬误，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汉以前的东西方贸易	(1)
第一节 中国商业的萌芽与交换的发展	(1)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贸易往来	(4)
第三节 中西方商业关系的早期历史见证	(6)
第四节 汉以前中国与西方之文化交流关系	(12)
思考题	(14)
第二章 汉唐的对外贸易	(16)
第一节 汉代的经济发展概况和丝绸之路	(16)
第二节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形成	(19)
第三节 汉代与东西方各国的贸易关系	(21)
第四节 唐代的陆路贸易	(26)
第五节 唐代的海路贸易	(29)
第六节 唐代中外贸易关系的发展	(38)
思考题	(44)
第三章 宋元代的对外贸易	(45)
第一节 宋元代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海外贸易管理	(45)
第二节 宋元代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和进出口的商品	(61)
第三节 宋元代对外贸易经营方式	(70)
第四节 对外贸易对宋元社会经济的影响	(73)
思考题	(77)
第四章 明清代的对外贸易	(79)
第一节 明清代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海外贸易管理	(79)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	(88)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96)

2 中国对外贸易

思考题	(98)
第五章 旧中国的对外贸易 (1912—1949 年)	(100)
第一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对外贸易 (1912—1927 年)	(100)
第二节 抗日战争前的对外贸易 (1928—1936 年)	(107)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贸易 (1937—1945 年)	(110)
第四节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对外贸易	(118)
思考题	(121)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贸易 (1949—1959 年)	(123)
第一节 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建立	(123)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126)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138)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历程	(144)
思考题	(154)
第七章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对外贸易	(156)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对外贸易战略及外贸体制的局部调整	(156)
第二节 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对外贸易	(159)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初期对外贸易的曲折发展	(164)
第四节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174)
第五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与地位	(177)
思考题	(181)
第八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对外贸易 (1978 年至今)	(183)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	(183)
第二节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189)
第三节 我国的对外贸易现状	(193)
第四节 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200)
思考题	(207)
第九章 中国技术贸易	(209)
第一节 技术贸易概述	(209)
第二节 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商投资引进技术的渴求	(212)
第三节 外商投资引进技术对中国技术创新的作用	(215)
第四节 世纪之交的国内技术贸易	(224)
第五节 入世后发展我国技术贸易的对策措施	(232)

第六节 开展技术贸易中应注意的问题	(239)
思考题	(243)
第十章 中国服务贸易	(244)
第一节 服务贸易概述	(244)
第二节 1979 年至入世的中国服务贸易	(251)
第三节 入世至过渡期结束的中国服务贸易	(256)
第四节 中国服务贸易的未来	(261)
思考题	(265)
第十一章 中国利用外资	(268)
第一节 利用外资概述	(268)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外资 (1979—2001 年)	(273)
第三节 中国利用外资稳步发展	(284)
第四节 中国利用外资与“走出去”战略	(287)
思考题	(290)
第十二章 中国企业“走出去”	(293)
第一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概述	(293)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布局与模式	(301)
第三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305)
第四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313)
第五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与措施	(316)
思考题	(324)
第十三章 中国对外贸易国别关系	(326)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国别关系概述	(326)
第二节 中美经贸关系	(332)
第三节 中日经贸关系	(338)
第四节 中欧经贸关系	(345)
第五节 中俄经贸关系	(350)
第六节 中韩经贸关系	(355)
第七节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	(360)
思考题	(365)

第一章 汉以前的东西方贸易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一直绵延不断。中国古代的东西方贸易自汉代后才开始频繁，且史料记载丰富。但是在汉代以前，即在远古、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当中，因交通条件、地理条件及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等因素所限，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向性特征并不明显，域外贸易往来十分有限，史料及各种物证也很贫乏，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一些历史考据的片断中，推断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丝丝缕缕，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间的交流源远流长。

第一节 中国商业的萌芽与交换的发展

商业并不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没有商业的时代，也就谈不上贸易活动了。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的物品有了一定的剩余，并形成了社会的分工，才有了不同产品所有者间从事商品活动的可能性。

商业最初的原始萌芽形态是以生产者直接的物物交换形式出现的，尔后才有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和民间的商业，在此基础上才会形成不同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往来。

一、汉以前商业的萌芽

中国远古时代的商业萌芽始于从原始部落到母系社会的转变。在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考古学家将他们称之为北京人（五六十万年前）、蓝田人（六七十万年前）以及元谋人（约 170 万年前）等。他们过着集体采集与狩猎的生活，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集体劳动的成果用来维持部落成员最低的生活需要都很困难，不可能有多余的东西进行交换，也无

所谓商业的活动。

这样的原始生活持续了几十万年到一百多万年，人类才逐渐从原始部落开始向氏族公社转变。氏族公社是以氏族为生产与生活单位的社会组织，最初形成的氏族公社是母系氏族。在这个阶段中，氏族内部按性别分工，并保存了一定的年龄分工。母系氏族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人们会制造种类多样的、适应性更强的石器，并发明了制造石器的技术。

最早的交换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作为装饰品的海蚶壳和赤铁矿碎块，这两种异物产于渤海湾一带，非本地产物，说明不是掠夺而来就是物物交换而来。

在之后出现的父系社会中，物物交换有了重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里，伴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个体家族有了独立经营的可能性，私有财产逐渐产生，各大家族间的经济差别逐渐拉大，父系社会进入了后期。这时的交换出现了新的特征，不同的生产部门间因专业分工所引起的交换开始出现，社会分工的进步扩大了传统交换的基础。在龙山文化时期，还出现了氏族内部不同产品生产者（家族）之间的交换。

进入夏时期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原始的城市，开辟了交通道路，夏的商品交换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考古发掘出的夏的成套的酒具来看，当时饮酒风气很浓。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这说明当时夏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夏的奴隶主贵族虽然掌握着主要的交换权力，但主要以役使奴隶从事贩运为主。自己则尚不具备完全商人的特点，不是真正的商人。当时夏的平民多余产品有限，商品交换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他们不大可能脱离生产劳动，因此也不可能成为专门从事交换的商人。

到了商代，中国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贸易的范围也有所拓展。商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文明大国。当时中国地域广阔，“南据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这种广阔的地域空间使“路车为善”的商人大有了用武之地，出现了长途贩运的商人。这从考古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实。考古学家认为，殷墟出土的鲸鱼骨、海蚌等物品应该是沿海区域的产物，因此应是与远方区域进行交易与交换的产物。

二、汉以前商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奴隶制到西周达到了顶峰。周人重视农业传统，但重农并不意味着排斥商业活动。因为周人对农业的重视，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多余粮食进入了流通领域成为商品，提高了农业商品的转化率。这使得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能够去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其中包括商业。

周朝时，各种工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都邑地区，当时的城市中出现了由国家管理的固定市场，这大大促进了商业流通的发展。但当时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国语·周语》中说：“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虽然商人被置于末位，但商业仍被列为“九职”之一。西周时期，大凡与西周王有贡献的臣属关系的各国，实际上均与西周王朝有贸易往来。中原地区所没有的龟玉金锡之类的宝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各国商贾（即西周王朝以外的诸蛮夷各国的商贾）才得以源源不断的输入到中原。西周后期，商人已经与身份不高的新兴农业生产经营者一起，构成了国人中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迅速发展和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铁制工具、牛耕技术等被广泛使用，垦地开荒、兴修水利等均有了便利的条件。至此，中国古代以铜、石工具为基础的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也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大好时机。

春秋时期，由于一些诸侯国非常强大，地区间的交通也有所发展。各诸侯国出于对外战争的考虑，也较重视道路建设。特别是水利交通的便利使得当时的人们还进一步去开凿人工运河，以谋求交通的更大拓展。最早开凿运河的是楚国，楚庄王时，就在云梦泽“激沮水作为云梦大泽之池”。

铸币在当时也广泛出现。考古发现，在洛阳附近不仅有铜币——空首布的成品，而且有大批的空首布内范，这直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这也是春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交通的发展、金属币的出现、城市的大量涌现，城市经济的繁荣等，都为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早期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自由商人在当时也成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到了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大大发展，农业生产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手工业品的交换也广为增加，商品交换更趋繁荣。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是制铁业，展性铸铁、块炼钢等金属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铁制工具的性能，青铜业中出现了鍍金和刻纹的新工艺。战国的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琉璃器，上面雕有各种物品的花纹。在纺织业中，麻、丝织品遍及各地，生产出了绌、锦、绣、缎等各种高级织物，还出现了织锦、提花丝帛。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丝织业的发展，使丝织品走出国界，辗转远销至波斯、希腊和印度。

因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战国时期的生产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导致战国时代商品交换的新发展。当时，大宗的农副产品、如粮食、丝、麻、葛、漆、畜牧产品等贸易与盐铁行业一起，成了商业发展中新的、规模更大的行

业。“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是当时常见的交换活动。这时地区间的交换也不断扩大，地区间的物资交流的增加成为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的手工艺劳动积累也造成了地域的分工，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手工业，如“洞庭之鱖，东海之鲈，醴水之鱼，……昆仑之苹，……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大夏之盐，……不周之粟……江浦之桔，云梦之柚”，都是各地的土特产。当时韩以制造弓弩著称，荆楚以制造刀剑、铜镜、漆器见长，邯郸以铁器著称，巴蜀以竹木之器见长，齐以丝、麻纺织品见长，中原以金属细工比较发达，长江中下游釉陶制造先进等。这些各地的特产与特色物品构成了当时四方交流的主要物资，由各国商人作为中介互通有无，各国的聘使也往往以这些地区的土特产兼做产品交易。

当时的战国，几个大国已经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狭小的地域割据被削弱了，道路比以前更加畅通，关卡比以前更少，各地区间水陆交通更为发达，这些都便利了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地区间交流的物资中，有一些是人们常用的，如木材等，商业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是统治阶段所需的奇珍异宝，这种交易使得各地区间不同的度量衡变得日益接近和趋于统一。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贸易往来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大力鼓励发展商贸活动，贸易的往来大大加强了各列国的经济实力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各列国的商贸政策

战国时期，各列国的商贸政策均以为诸列国间的商贸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目标。如齐国自立国以来就把商工之业视为国家的根本。《管子·轻重乙》篇中记载了关于齐如何大量吸引外商的办法：“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里说的是吸引各诸侯国的商人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修建宾馆，二是加强服务。这里的“客舍”指的是馆舍，具体的人住级别有三种：对有一乘（四马拉的车）的商人，可供应饭食；对有三乘的商人，除供应饭食外，还外加供应牲口的草料；对有五乘的商人，不仅供应食宿和供应马的饲料，还给他们配备五个服务人员。同时，齐国还规定：“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

勿人。”这里说的是关税和市税不能同时征收，对商人的空车和挑担子的商贩都不能收税。

郑国也十分重视商业，由于商人在郑国的建国中起了重要作用，桓公便与商人签订了盟约，给商人一定的经营自由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句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卫国本是周初的重要封国，春秋初期，卫被狄人所破，齐桓公出兵救卫，帮助卫国迁都，但卫国的实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卫文公也力图复国，并制定了“通商、惠工、务财，训农”的政策，使卫从国破家亡、荒凉衰败的境况中走上了国家富裕之路。

晋国在春秋时期也是一个大国。晋文公即位之初，就采取了“轻关易道，通商惠农”等措施吸引外来商人，促进跨地区贸易以壮大本国的经济实力。晋悼公时，还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的政策，开放山泽之利，让人民经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因而在与楚国的长期争霸中，经常处于优势。

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保障列国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和通商贸易，列国在会盟中还订立了一些保障商贸活动的条款。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会合周、鲁、齐、宋、郑、许、曹诸国订立了盟约。其后，公元前579年，晋楚会盟，约定要求各国保护往来贸易的商人，给他们提供方便；要求各国间的粮食贸易要正常化，不准阻止和垄断粮食贸易；要求各国不要过多地设关立卡，以免商路被阻。以此保障了各国间的贸易能正常地进行，使商人在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较自由地往来经营。

二、各列国间的贸易往来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贸易十分繁荣。《荀子·王制》篇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翮、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诸国通过贸易往来均可获得周边国家的物产，满足本国的各方需要。

当时的齐国鱼盐和手工业品十分丰富，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他们主要进行转手买卖，用低价购买东莱的鱼盐，然后运输到别国。《国语·齐语》篇载：“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说的是从东莱打开运输鱼盐的通道。“有海之国，售盐于吾国，釜十五，受而官出之以百”，说的是齐国的商人以每釜十五的价格购进，又以每釜一百的价格售出，转手就获得几倍的厚利。除食盐之外，由精巧的“女红”织出的丝织品，也经常远销到其他的诸侯国，所谓“织作冰绮秀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楚国物产丰富，尤其是矿产资源在列国首屈一指，楚国的谷粟、布帛、丝絮、竹木、漆器、皮革都已进入诸国市场，而湘波鱼、大龟、珠玢、犀角、象齿、羽毛、丹砂、菁茅等，则更是诸国市场的紧俏货。《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篇载楚声子对令尹子木云：“祀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反映了当时楚国的优质木材、皮革输入晋国的情况。楚国丝织品除自用外，还输往国外。晋公子重耳及楚，楚国人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从这里可知楚国的丝织品也远销到黄河以北。

而作为河内八大都会之首的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是黄河北岸通往太行山以东平原的要津，有进行对外贸易的便利，各地商贾也纷纷云集此地。

郑国在春秋前期迁都新郑，位于济、洛、河、颍四水之间的中原中心地区，交通十分便利，是中原的要津之地，是南北东西的交通中转站。郑国的统治者充分利用了这种有利的地理环境，大力发展商贸事业。《左传》载，郑国商人的活动范围远及国境以外。僖公三十三年，秦师偷袭郑国及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去做生意，在半途遇到秦国的军队，就以乘韦先牛十二犒赏秦军，以拖延时间，并迅速派人回去通风报信。郑国的商人或市于周，或贾于楚，或如晋，或适齐，其经商的范围十分广泛。

商贸活动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地域界线，天南海北的商品互通有无，各地的物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山西饶材、竹、玉石等，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桂、姜、金、锡、连、丹砂、犀，龙门、揭石北多马、牛、羊、筋角与铜铁等。本来此地使用价值不高或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经过商人进入流通，到了彼地，就变成有用的东西。那些自由的商人，密切注视各地区不同的产品、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价格，把握时机，调剂余缺，在都市与都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和融合功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国的政治界限，促进了文化、信息等的交流。

第三节 中西方商业关系的早期历史见证

汉以前时期，中华先民各族不仅在中华大地内各族、各区域间互相交流，更在与中华大地外的民族、国家间进行不断扩大的互相交往。

一些论者曾撰文指出，在生产水平低下、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国所处临海面山的地理环境，给中外贸易交流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而且，中国北部与西部有着强悍的少数民族，经常侵扰中原，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修筑长城加以阻隔。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加以推广延伸，修筑起了万里长城，将自己封闭起来。因此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间的贸易与物资交流确实不断，但中国与域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却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而显得十分艰难。

但是就目前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中国与域外的物质、人员交流还是相当多的，在新疆、内蒙古、四川三星堆、云南滇池、浙江河姆渡等地考古所发现的外域文明已足以雄辩地说明这一点。“源于草原文化的周秦文化都带有西方色彩，料器（琉璃器）、三棱铜箭头以及铁器、屈肢葬这些因素在中、西亚早一步，是周人和秦人把西方的这些因素带到中原来的，这样就将中国与欧亚大陆连起来了”。

学者们考证与推断，当时中国与西方距离十分遥远，远洋贩运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通过陆路分段前进，辗转艰难的建立起中西方早期的经济关系。当时东方输往西方的主要商品有香料宝石与中国丝，搞转手贸易最活跃的主要是大夏、安息和印度。

一、手工艺品交易的早期见证

贩卖珠宝、玉器、金银制品、丝绸织物等贵重的奢侈品、手工艺品是最能获利的商业。这些体轻、价贵、便于远地转运的商品在古代一直就是商人获得巨额收益的主要目标。在东方，朝鲜公元前几个世纪的墓葬和遗址中，曾屡次出土中国制造的铜镜、铜剑和燕国的“明”字刀币，这说明在战国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着一定的经济贸易联系。秦灭了燕以后，卫满率人渡溟水（今朝鲜清川江）退避朝鲜，决非偶然。

据考证，当时的楚国同今天的中亚、东欧、西亚与东南亚都建立了直接与间接的商品贸易关系。西北方向，楚国商人已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今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今俄罗斯南部阿尔泰边区）发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其年代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墓中出土了堪称标准的楚式的四山镜和丝织刺绣品，其中丝织刺绣品的丝纤维、花纹风格（龙凤）以及刺绣工艺手法（锁绣）都与长沙的战国墓出土的龙凤纹刺绣相同，这说明楚国的商品已经远销到中亚与东欧了。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考古也提供了楚国商品传入的物证。据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一文介绍：“在东山时期（约公元前五世纪），文郎文化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传播，……与战国艺术初次接触……开始同印度和西亚地区进行交流。出现铁器和漆器”。漆器是楚国大理制造的产品之一，具

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与东山文化初次接触的战国艺术很可能是楚国的文化艺术。夏里臣《1964年在马来西亚考古发现》一文中介绍：“近来在马来西亚各地发现了大理的琉璃珠，绝大部分是中东产品，也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时代从公元开始甚至是更早一些。”公元前中国范围的琉璃珠，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莫过于楚国。

楚国在发展商品贸易的同时，对经商范围和商品的种类也做了一些限制，如“毋载金、革、龟、箭”的规定，但是商人们为牟取暴利宁可铤而走险，如中原并不产铜，而铜器却并不少见，其中必有红铜是通过不法商人走私到中原去的。而这些禁运的物资既然到了中原，也必定流入其他地区甚至突破当时中国的国界，这种行为虽然有违楚国的禁令，却促进了当时中国同域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战国时期中西方贸易的活跃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战争成了时代的主题。“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个性大解放，贵族、士人、工商、农民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是为了生计，辗转四方者不计其数。

商人以贩卖为业，通四方之货物，其周游天下，自为理所当然。《管子·禁藏》篇曰：“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使下，私营商人打破一切界线，足迹遍布各个角落。

当时还有一类流动就是手工业者的流动。春秋战国时期，“官工商”的格局破坏，一些手工业者可以独立开业，他们步商人的后尘，开始向四方迁移。《韩非子·说林上》篇曾记载鲁国一善织履者想迁徙到越国。另外《管子·小问》篇云：“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这些例子说明当时的手工业者流动也十分频繁。这种商人的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列国之间，而且也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大规模的谪发贾人等增援岭南，也有利于南方周边的贸易与域外贸易的发展。

二、中国丝绸之西传

丝织品是中国汉以前中西方贸易的重要见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开创的历史是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丝绸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丝绸的发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纺织纤维的蚕丝利用以及家蚕的驯化。关于蚕桑丝绸的起源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中流传着不少的神话和传说，

其中较重要的是黄帝和嫫祖的故事。《史记·黄帝内传》：“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称织绸之功”；《史记·黄帝本纪》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把蚕桑丝绸的发明权归于黄帝，但元初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外纪”所载则与此稍有不同，认为丝绸是来自四川一带的嫫祖发明的：“西陵氏之女嫫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痂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考古发现的丝绸，首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丝织品，经用¹⁴C测定与此同时出土的稻谷，年份为公元前2750±100年。1984年，河南省在发掘荥阳县育台村一处属仰韶文化的遗址时，发现了公元前3500年前的丝麻纺织品。这两处考古文物说明在距今约五千年之前，我国的大江南北都已有蚕桑丝绸的生产，中国的丝绸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可见中国蚕丝发明很早，从传说黄帝妃嫫祖始教民育蚕、以丝为帛后，至夏、商，丝织业有了更一步的发展，到春秋时期，吴楚两国为争桑而发生的战争，无不与丝绸有关。

西方人称中国人为“赛莱斯”，称中国为赛里古姆，其语均源自丝的译音。战国时期，由于雕文刻镂、锦绣纂组等手工艺的发达，商人们增加了商品贸易的来源。中国的丝纺制品在战国时期已经先后出现于中亚、印度、波斯和埃及、希腊的市场，丝织品这一历史悠久的中国名产维系着中西方之间的商业上的联系。

当时，楚国的丝织刺绣不但输往西南地区，而且外销到中亚及印度。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之缁（帛之总名）或已越帕米尔，而至印度、波斯以及亚历山大大王东征以后，及又经叙利亚，输入欧洲。”这个推断有大量的历史记载与考据为证。

世界通史记载，亚历山大大王死后，帝国分裂，其部将托勒密建立王朝，统治埃及，工商业强大兴旺，港口巨大，灯塔矗立。埃及的粮食、织物、纸草和玻璃制品输往地中海各国，贸易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品，如从中国进口的丝，从印度运来的象牙、珍珠、香料以及从阿拉伯那里输入的宝石等。其中以中国的丝绸地位最为显著。

古希腊人殖民地遗址中曾有丝的发现，法国考古团在波斯、贝尔格曼、额济河等地均有丝的发现。

那么这些丝绸是如何到西方的呢？据考证，在公元前3世纪，即中国秦统一前，在叙利亚、埃及的前站，经手丝绸贸易的是安息与大夏，而安息与大夏的前站则是印度。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已传到印度。印度此时也处于奴隶制